

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下四川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作用机理与保障机制^{*1}

蒋瑛 孙婷婷

【摘要】：四川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面临首位城市人口承载压力过大、贫困地区城镇化进程缓慢、农业转移人口异地市民化规模大等现实困境。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的实施，通过提升首位城市品质来疏解成都人口压力，通过推进市县差异化、一体化发展来提高贫困地区城镇化水平，通过壮大五大经济区优势产业来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市民化。多点多极背景下，应以有序转移、就近转移、成本合理分担为重点，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保障机制。

【关键词】：多点多极支撑 四川 农业转移人口 市民化

【中图分类号】：F3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470 (2018)—04—0099 (06)

一、引言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农村转移到城镇的人口，在经历城乡地域迁移和职业身份转变的同时，获得城镇居住身份，平等享受城镇居民各项社会福利和政治权利，成为城镇居民并完全融入城镇社会的过程。⁽¹⁾ 中央政府高度重视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201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将“积极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列为头号任务。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要“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显著，各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面临的基础条件、历史进程、现实困难有很大的不同，学术界越来越重视从区域自身发展特点出发研究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对于四川省，现有的研究大多把焦点放在成都，从构建成本分担机制、⁽²⁾ 分析意愿影响因素、⁽³⁾ 组织参与社区治理、⁽⁴⁾ 推进户籍制度改革⁽⁵⁾ 等角度开展了许多研究。但是，在四川省委大力推进“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的背景下，除了成都，更多的市州经济、县域经济正处在加速突破的快车道上，将对全省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因此，根据十九大提出的区域协调发展要求，研究“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影响，构建符合“多点多极”特征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保障机制，对顺利推进四川新型城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四川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现实困境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四川人口总量排全国第四，其中农村人口占59.8%，总量排全国第三。随着新型城镇化和新型工业化进程的加快，作为西部头号人口大省，四川的农业转移人口规模庞大，在市民化的过程中面临着诸多特殊困难。

1. 省会城市人口承载压力过大

省会成都是全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明确的首位城市。2016年，成都的GDP达到12170.2亿元，

¹ *本文系2016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国际援助和开发合作体系创新研究”（编号：16ZDA037）、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急管理重点项目“‘一带一路’与中国西部发展”（编号：717420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蒋瑛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四川成都 610065

孙婷婷 博士研究生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 四川成都 610065

排四川省第一位, 占全省 GDP 总量的 37.2%。⁽⁶⁾ 经济发展“一枝独秀”的背后, 是人口的大量涌入。2016 年, 成都市常住人口 1591.8 万, 占全省常住人口总量的 19.3%; 城镇化率达到 70.6%,⁽⁷⁾ 比全省平均水平高 21.39 个百分点。⁽⁷⁾ 与 2006 年相比, 十年间成都的常住人口增加了 343.3 万, 城镇化率提高了 9.1 个百分点。人口的过快增长给成都的城市建设、环境保护和公共服务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陈世莉、蒲星辰通过对卫星遥感影像数据的分析, 认为人口快速增长是成都市城市加速扩张的重要推动因素。⁽⁸⁾ 杨娟等认为由于人口过快增长, 成都市生态需求远远超过了其生态承载力, 未来成都市的生态发展压力非常大。⁽⁹⁾ 眭海霞等经过测算, 认为成都市农业人口市民化在 2013 年的人均总成本约为 285760 元, 其中政府负担 160000 元左右, 约占 56%。⁽¹⁰⁾ 她还认为, 到 2020 年, 成都户籍人口将达到 1450 万人, 并有 200 万左右的农业转移人口需要转变为市民。⁽¹¹⁾ 照此规模, 2020 年前, 政府在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方面至少需要投入 3200 亿元, 而 2016 年成都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仅为 1175.4 亿元。⁽¹²⁾ 由此可见,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规模的持续扩大, 将对成都各级政府的财力造成巨大的压力和挑战。综合来看, 农业转移人口的大量涌入为成都经济领跑四川作出了重要贡献, 但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而言, 疏解人口压力才能进一步释放成都的发展空间。

2. 贫困地区城镇化进程缓慢

四川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报告中提到, “人口多、不平衡”是四川最大省情之一。人口上的不平衡发展, 集中体现为贫困地区城镇化进程滞后。四川省 183 个县中, 有 60 个位于国务院明确的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 其中 41 个是少数民族自治县。⁽¹³⁾ 根据四川省统计局发布的数据, 2014 年这 60 个县的总体城镇化率为 31.8%, 比四川省平均城镇化率低 15.22 个百分点。分发展阶段看, 这 60 个县中, 有 37 个城镇化率低于 30%, 处于城镇化初期阶段; 有 23 个城镇化率介于 30%到 61%之间, 处于城镇化中期阶段, 其中仅有巴州、康定、马尔康、九寨沟四个县的城镇化率达到全省平均水平。当前的研究普遍认为, 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内容是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两者相互支撑、同步发展。从 60 个县的发展现状看, 四川省贫困地区在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中面临着特殊难题: 一是与省内其他地区相比, 这些地区贫困人口多、贫困程度深、贫困面积大、返贫率高,⁽¹⁴⁾ 只有加快县域整体脱贫步伐, 才能将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释放出来, 向其他产业转移; 二是这些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 地方财政收入基本停留在“吃饭财政”的阶段, 现有财力难以负担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高昂的社会成本; 三是这些地区的农村人口受教育程度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职业技能欠缺, 就业能力和对城市生活的融入能力较差; 四是少数民族特有的宗教文化和风俗习惯让他们对新生活方式的接受和适应需要更长的周期。

3. 农业转移人口异地市民化规模大

如果将农村生产生活方式向城市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视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标志, 那么其主要有两种模式: 一种是农业转移人口跨区域流动到城市务工, 最终以产业工人的身份在城市生活, 这种模式被称为“异地市民化”; 另一种是农村人口近距离迁移到家乡附近的城市或城镇, 实现了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转变, 进而实现了城镇化和市民化, 这种模式被称为“就近市民化”。⁽¹⁵⁾ 改革开放近 40 年来, 中西部农村大量的富余劳动力向东部集聚, 并转型成为产业工人, 将异地市民化推向高潮, 同时也带来大城市拥堵、乡村空心化、农民社会保障难等一系列问题, 还进一步强化了城乡二元结构, 导致只有极少一部分农业转移人口能真正在大城市安家落户并转为市民。当前, 学者们和政府部门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就近市民化对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意义。清华大学李强教授十分倡导就近市民化, 因为这种模式能在避免“城市病”的同时, 充分发挥中小城市的人口、经济集约化优势, 从而实现大中小城市均衡发展。⁽¹⁶⁾ 杨云善也认为, 就近市民化不仅能避免“城市病”, 还可以缓解“乡村病”, 解决“半城镇化”问题。⁽¹⁷⁾ 中央政府也注意到了异地市民化带来的突出问题。2014 年, 国务院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要着重解决好“三个 1 亿人”⁽¹⁸⁾ 问题, 正式将“引导约 1 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确定为重大政治任务, 并将就近市民化明确为城镇化的主导模式。

表 1 四川省农民工转移输出情况

² ①此处所指的城镇化率为常住人口城镇化率, 下同。

³ ②三个 1 亿人具体是指促进约 1 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 改造约 1 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 引导约 1 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

年份	全省农民工		省内就业农民工		省外就业农民工		外派劳务	
	总量(万人)	占全国农民工比重%	总量(万人)	占全省农民工比重%	总量(万人)	占全省农民工比重%	总量(万人)	占全省农民工比重%
2011	2300.5	9.1	1091.7	47.4	1205.2	52.4	3.6	0.2
2012	2414.6	9.2	1291.9	53.5	1117.3	46.3	5.5	0.2
2013	2455	9.1	1246.8	50.8	1200.1	48.9	8.1	0.3
2014	2472.3	9.0	1313.1	53.1	1154.7	46.7	4.5	0.2

注:根据国家统计局《2014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和四川省统计局《农民工市民化影响因素及路径探索——基于2015年四川省进城务工人员市民化现状调查》相关数据整理。

由于农民工占农业转移人口的绝大部分,因此本文聚焦农民工这一群体,分析四川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特点。根据国家统计局和四川省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1年至2014年,四川省每年外出的农民工都保持在2300万人以上,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9%左右,是典型的农民工大省。从流向来看,除极少部分通过劳务派遣方式赴海外工作的以外,选择省内就业的农民工约占47.4%~53.5%,选择省外就业的农民工约占46.3%~52.4%(见表1)。也就是说,四川省每年至少有1000万农民工在省外就业,这部分人口也是潜在的异地市民化人口。如何引导1000多万的省外就业农民工就近市民化,关乎着国家“三个1亿人”战略的顺利推进,也考验着四川省各级政府的执政智慧。

三、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作用机理

四川省委实施的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是四川区域经济发展历程中的一次重大变革,其核心思想与十九大提出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不谋而合。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对不同区域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有着不同的作用机理。

1. 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的内涵

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指四川在提升首位城市的同时,着力次级突破,夯实底部基础,通过全方位激发各地发展活力,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形成首位一马当先、梯次竞相跨越的区域发展新版图。⁽¹⁸⁾自2012年四川省委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在全省实施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以来,“多点多极”已成为四川区域经济发展的总揽性战略。从发展目标上看,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旨在巩固成都省会城市地位的同时,培育更多的区域经济增长点和增长极,通过区域协同共兴带动全省经济的跨越提升,将四川省打造成为“引领西部、面向全国的核心增长区域”。从具体路径上看,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对省会城市、市州梯队、县域经济和区域板块规划了不同的发展道路:一是成都作为省会城市要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并带动引领其他区域快速发展;二是其他市州要通过错位发展提高经济竞争力,并不断增强区域中心城市综合实力;三是县域经济要突出特色,强化市县联动发展,不断夯实四川经济发展的底部基础;四是五大区域板块要找准定位,集中力量发展优势产业,打造国家级产业基地。值得注意的是,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的内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将根据国家政策取向和四川的省情变化而不断完善。

2. 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提升省会城市品质, 疏解成都人口压力

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的首要着力点在于“省会一马当先”, 在强调成都的省会地位的同时, 更加注重发挥其“头马”效应, 有效带动其他区域加速发展。因此, 未来成都市的发展重点在于“对内提升品质”和“对外引领带动”。一是通过建设国家中心城市提升城市品质。2016年5月, 国务院批复的《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将成都确立为国家中心城市。随后, 成都市委提出要紧紧围绕“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目标, 不断优化城市空间结构, 重塑城市经济地理, 并明确要“优化中心城区功能, 降低人口密度, 提高产业层次, 提升城市品质”。^[19]可以预见, 疏解中心城区人口将成为成都城市品质提升的重要手段。二是通过产业合作强化引领带动效应。目前, 成都市委已经将成都平原经济区纳入成都的城镇体系,^[24]并提出要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转移, 实现人口、城市、产业相互融合。在此背景下, 成都与周边地区的产业合作将进一步深化, 向外转移输出的产业规模也将进一步提升, 一大批以农民工为主体的产业工人也将加速向外转移。总体看来, 在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的指引下, 随着成都城市品质提升和产业向外转移速度加快, 成都的人口压力将大为缓解。

3. 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推进市县差异化、一体化发展, 提高贫困地区城镇化水平

四川省委实施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的初衷就是要推动市州经济突破和县域经济繁荣, 缩小各市州和县域之间的发展差距,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更加扎实的基础。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的推进, 将为省内落后地区城镇化提供重要契机。一是通过差异化发展扩大经济总量, 夯实城镇化基础。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明确提出要“支持市州错位发展、竞相赶超”和“引导县域经济因地制宜、培植优势”, 旨在促进市州和县域经济差异化发展, 避免重复建设和无序竞争。同时, 在具体目标上, 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提出“力争有10个市州经济总量超过2000亿元, 有5个左右市州超过1500亿元, 更多县(市)跨入全国和西部百强县行列”。可以说, 差异化发展为贫困地区指明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 规避了他们在人才、资金、技术等方面的短板, 也避免与其他市州和县域在资源、项目上的恶性竞争。而千亿级和百强县的量化指标则为贫困地区树立了明确的发展目标。在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的指导下, 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思路更加清晰, 发展动力更加强劲, 有利于经济总量的提升和城镇化进程的加速。二是市县协同联动发展有利于基础设施一体化, 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四川贫困地区城镇化进程滞后的一大原因在于基础设施的不完善和公共服务不到位, 但依靠他们自身改变这种困局非常艰难。一般而言, 相对于县域, 市一级的交通、信息网络、商贸、物流等体系更为健全, 教育、医疗、科技资源更为丰富, 对农业转移人口的吸引力更大。因此, 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特别强调增强区域中心城市综合实力, 进而推进市县协同联动发展, 主要目的就是推动市一级的基础设施向基层延伸, 促进市县公共服务均等化, 带动贫困落后地区城镇化发展。在这一点上, 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高度契合李强教授提出的“以地市为单位推进全域的城乡一体化和就近城镇化”。^[20]

4. 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壮大五大经济区优势产业, 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市民化

四川农业转移人口异地市民化比重高, 根本原因在于省内的非农产业发展慢, 就业机会少, 农村富余劳动力流向第二、第三产业的渠道不宽。第二、第三产业的显著特点之一是集聚发展, 但这种集聚在空间上往往超越了市州的界限, 仅仅依靠市州政府难以推动重大产业的空间集聚。因此, 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以经济区为单位对全省的产业发展进行了规划, 找准了五大经济区的优势条件, 指明了重点产业方向,^[25]既避免“一刀切”造成的资源浪费, 又能最大化整合市州力量, 促进产业的空间集聚和规模提升。只有五大经济区优势产业发展起来了, 才能将人口真正留下来, 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市民化, 完成“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的四川任务。综上所述, 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通过对省会城市、市州梯队、县域经济和区域板块实行针对性的政策引导, 达到让大城市瘦身, 让落后地区提升, 让区域产业繁荣的目的, 极大地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

四、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背景下四川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保障机制

⁴ ③成都平原经济区包括成都、德阳、绵阳、遂宁、资阳、眉山、乐山和雅安8个市。

⁵ ④根据四川省委的规划, 成都平原经济区重点发展现代高端产业, 川南经济区重点发展先进制造业, 川东北经济区重点发展清洁能源化工产业、特色农业、生态文化旅游业, 攀西经济区重点发展战略资源产业、康养旅游业、水能资源开发产业、亚热带特色农业, 川西北生态经济区重点发展生态文化旅游业、可再生清洁能源产业。

从理论上讲, 多点多极支撑发展战略能有效促进四川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但在实践中, 这一目标的顺利实现还需要一系列体制机制予以保障。

1. 坚持分类引导, 形成有序转移机制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一般要经历“转移就业(职业身份转换)——均享服务(共享基本公共服务)——取得户籍资格(社会身份转换)——心理和文化完全融入城镇(成为真正市民)”等四个阶段。^[21] 成都作为省会城市和特大城市, 目前落户条件在省内最为严格, 农业转移人口即便能实现职业转变, 但要想取得户籍十分困难, 也就无从享受户籍所附加的各种市民福利和公共服务。对成都而言, 在建设国家中心城市过程中, 一部分拥有较高职业技能的农业转移人口将成为推动城镇产业升级的重要劳动力资源, 而另一部分农业转移人口将随传统产业转移而流出成都。因此, 成都应改进现有的户籍制度, 让拥有较高职业技能的农民工能顺利落户, 并提供完善的教育、医疗、养老、职业培训等公共服务, 让他们真正享受市民待遇, 走出目前“半市民化”困境; 另一方面应积极推动产业合作和产业转移, 并在这个过程中充分保障农民工的各项权益, 为他们的市民化奠定良好基础。对其他市州而言, 在国家“除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外, 其他城市不得设置落户限制”的宏观政策背景下, 农业转移人口已无落户门槛。但是, 社会身份的转变并不代表进入城镇的农业转移人口能完全享受优质的公共服务并真正融入城市。下一步, 市州层面应着重提升“市民”身份的“含金量”, 对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加快予以城镇户籍确认, 对已取得城镇户籍的农业转移人口提供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 让更多的农业转移人口能够在城镇实现安居乐业。

2. 加快中小城镇建设, 形成就近转移机制

根据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调查, 以德阳市为例, 愿意在城镇定居的农民工中, 96.5%首选附近城镇, 仅有3.5%选择外地城镇。他们认为, 依托地级城市和县级城市的就近城镇化, 非常符合很大一部分农民改善生活和居住条件的需求。^[22] 因此, 加快中小城镇建设既符合多点多极的战略导向, 又有利于形成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市民化机制。一是加快提升中小城镇基础设施水平, 以道路交通、城市管网、信息网络、环保设施等建设为重点完善城镇基础功能, 加快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增强人口承载能力。二是积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 保障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享有平等教育资源, 加快建立与农业转移人口需求相适应的就业服务体系, 强化社会保障服务, 提高基层医疗机构服务水平, 将城镇保障性住房覆盖面扩大到农业转移人口。三是突出发展特色经济, 根据当地实际打造特色城镇, 强化产业支撑, 带动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就业。四是扩大基层政府管理权限, 下放事权, 扩大财权, 改革现行人事权和强化用地保障等为重点, 赋予重点镇部分县级管理权限, 提高行政效率, 为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提供更完善的行政服务。

3. 动员多方积极参与, 形成成本合理分担机制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由个人成本、企业成本和政府成本三部分组成, 其中政府成本占主体, 企业和个人成本为辅助。政府成本由上级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承担, 以地方政府为主体。对许多四川贫困地区而言, 过重的成本负担降低了地方政府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积极性。因此, 构建政府(上级政府与地方政府)、企业、个人三位一体的成本分担机制是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要保障。一是建立与各级政府事权责任相适应的公共财政投入机制。地方政府要承担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在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的公共成本。但是, 自从分税制改革以来, 较低的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与其繁重的事权严重不匹配, 许多公共支出无法得到保障。因此, 建议中央和省级政府加快完善转移支付制度, 建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专项投入机制, 允许有条件的地区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拓宽城市建设融资渠道, 用于弥补地方财力的不足。同时, 建议地方政府积极运用社会资金, 通过PPP等模式撬动社会资本、民间资本投入公共项目, 减轻财政压力。二是健全企业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成本分担机制。企业要严格执行同工同酬制度, 不能对农民工实行差异化工资。同时, 企业还要加快建立针对农民工的技能培训体系, 按时足额为农民工缴纳各项社会保障费用。政府部门要加快完善就业制度和劳动保障制度, 加强信息监测, 规范企业用工行为。三是完善个人成本分担机制。有关部门要加强政策宣传, 引导农业转移人口参加社会保障和职业培训, 并自觉缴纳有关费用, 帮助他们尽快适应城镇生活。同时, 地方政府要在尊重群众意见的基础上, 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流转机制, 切实保障农民离开农村后依然能享受土地收益, 加强农业转移人口

市民化的资金保障。

参考文献:

- (1) 魏后凯, 苏红键. 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研究[J]. 中国人口科学, 2013, (05).
- (2) (10) 眭海霞, 陈俊江.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成都市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研究[J]. 农村经济, 2015, (02).
- (3) 宋周, 黄敏, 李正彪.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及影响因素——以成都市为例的分析[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05).
- (4) 张志宏, 张璇. 农业转移人口参与社区治理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以四川省成都市为例[J]. 城市发展研究, 2016, (10).
- (5) 李鹏, 王庆华. 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户籍政策设计的比较研究——以成都和嘉兴为例[J]. 中国经贸导刊, 2014, (26).
- (6) (7) (12) 成都市统计局, 国家统计局成都调查队. 2016年成都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N]. 成都日报, 2017-05-24.
- (8) 陈世莉, 蒲星辰. 基于RS的成都市城市扩张监测与分析[J]. 资源开发与市场, 2012, (09).
- (9) 杨娟, 王昌全, 曾世勇. 1987~2006年成都市经济生态可持续发展分析及ARIMA预测[J]. 四川农业大学学报, 2010, (01).
- (11) 眭海霞, 李晓梅, 陈俊江. 成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研究[J]. 开放导报, 2014, (06).
- (13)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Z]. 2011.
- (14) 黄毅, 韩琳玉. 新型城镇化视角下民族地区反贫困问题研究[J]. 农村经济, 2015, (06).
- (15) 田珍, 秦兴方. 农民市民化的路径选择与逻辑次序——基于农民群体分化的视角[J]. 农村经济, 2010, (06).
- (16) (20) 李强, 陈振华, 张莹. 就近城镇化模式研究[J]. 广东社会科学, 2017, (04).
- (17) 杨云善. 农业转移人口就近市民化存在的问题与对策——以中西部地区为例[J]. 中州学刊, 2016, (06).
- (18) 省委经济工作会议: 四川发展要着力构建多点多极支撑[N]. 四川日报, 2012-12-30.
- (19) 范锐平. 深化改革开放聚力创新发展为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国家中心城市而奋斗[N]. 成都日报, 2017-05-02.
- (21) 张卫, 何雨, 王树华. 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障碍及其对策研究——以江苏为例[J]. 现代经济探讨, 2013, (12).
- (22) 李强, 陈振华, 张莹. 就近城镇化与就地城镇化[J]. 广东社会科学, 2015, (01).